

（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出版）

本期目录

【史海钩沉】	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（上）	刘建业
【往事非烟】	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	江畹铸
【史实辨析】	“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”作者江畹铸之谜	张鹤慈
【亡灵祭坛】	郭世英之死	周国平

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厅”
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浏览，网址为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（上）

• 刘建业 •

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：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——分别是1967年7—8月从武汉“720事件”、“揪军内一小撮”到下令抓捕王关戚和1974年“批林批孔”运动的突然爆发到戛然而止。谈谈这两次急转弯的背景，转弯的具体过程以及表象掩盖下的真正原因。

◇ 我们先说第一个急转弯。

（一）武汉“720事件”的背景。

第一小点：军队文革大的背景

军队的文革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“16条”明文规定在总政治部统一安排下进行。到了1966年10月1日，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“红纵”某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向林彪告状，说军队院校文革条条框框太多，林彪当即叫来总政副主任、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，下令立即起草一个规定，让军队院校“文化大革命”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”。

林彪交待：规定起草后直接送中央文革修改，定稿。这就是有关军队院校文革的“紧急指示”，主要内容是两条：一是军事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搞法；二是要当众销毁工作组时期整学生的“黑材料”。

这个“紧急指示”一出台，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查抄“黑材料”的高潮。军事院校造反派不甘落后，频频为追查“黑材料”冲击领导机关，抢、砸档案室。问题是，档案室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地方，不仅有很多机密文件，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。可造反派可不管你那么多！这样，有人要冲、有人要保，制造了很多矛盾冲突。军队首脑机关的工作大受干扰。

1967年初，中央文革对刘志坚不满，改组全军文革。谁来接任组长呢？江青推荐了徐向前元帅，并由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。我个人认为，江青之所以推荐徐帅，是看重徐帅不争权、不好事的性格——1949年以后，徐一直安于被边缘化的现状。按照江青的“小九九”，徐帅还像以前那样挂个空名，她就可以借机在军队发号施令，扩大影响。孰料徐帅接任后，却非常积极，江青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

比如，在总后邱会作问题上就和叶剑英的意见相左。上面说到的上海二军医大“红纵”，在京城那也是名震四方。他们把总后勤部搅得天昏地暗，把部长邱会作斗得半死。叶帅知道后，把邱保护在西山。造反派找不到，就向全军文革告状。徐向前打电话让邱回总后接受批判，邱问徐：你是用什么身份？如果个人身份，我拒绝；如果以军委副主席身份，我服从。徐说，以军委副主席身份。邱只有服从。还有人劝阻，邱说，因为我，两个元帅都闹意见了，我还能不去吗？

结果邱回去以后，被打得半死。利用午休看管人不注意，在烟盒纸上写求救信，托人送给他老婆胡敏。胡找到叶群。最后还是叶群拿着林彪的手令，才把邱会作救了出来。从此邱把叶群的解救日视为再生之日，死心塌地为林家卖命。既给他带来了林彪提携的飞黄腾达，也遭受了“913”之后的牢狱之灾。

徐帅上任后还发现，军队各级首脑机关被造反派冲击得七零八落，这怎么行？

得出台个规定，不能随意冲击军队领导机关。徐将这些意见报告林彪，林一直不答复。后来徐帅急了，干脆闯宫，直接乘车到了林彪驻地。林不能不接待了。两个人就在林的驻地，拟了个七条命令。又经周恩来、聂荣臻等修改润色，毛又加了一条，领导干部教育好自己的子女。于是“军委八条命令”正式出台。

此时各地军头对冲击军队首脑机关的反军派，正无可奈何呢，要求军队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”啊，“军委八条命令”犹如久旱逢甘霖。有了尚方宝剑，各地几乎是不约而同，大抓反军派。各地造反派频频向中央文革告急。

到了1967年4月，中央军委又出台了“10条命令”，这时几位老师已经因“二月逆流”靠边站了。“10条命令”规定军队“不准开枪”，“不准随意捕人”，“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”，“不要进行群众性的‘请罪’运动。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”……这下子再次把军队的手脚捆住了。

第二小点：武汉军区的具体情况。

武汉军区的具体情况是，“八条命令”下达后，他们抓了500多名“反军派”，解散了武汉工人造反组织“工总”；“10条命令”下达后，造反派要求为工总平反，释放被抓的群众。

1967年3—4月，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。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参加。陈再道在会上发牢骚，说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，偏听偏信，听不进军区的反映，请示也不回复。他建议，要么中央文革在各省派出大员，具体指导该省的文革运动；要么各地派联络员到中央文革，建立一条互通的渠道。不知为什么毛和中央文革不予采纳。今天看，如果真按陈再道的建议办，少发生多少冲突和武斗啊？武汉的“720事件”也就不会发生。

可能是受到了某种压力，中央文革4月19日开了一次联席会，听取武汉军区意见，形成了几条“共识”。大意是：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；武汉军区3月份逮捕500多人并非错误行动，但要逐一复查，确定无罪的应当释放；还有一条是工总不应当恢复，因为是“10条命令”前解散的。中央文革决定4月21日由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派，做他们的工作，此前要保密。

这是一个对军区十分有利的方案，陈、钟两位喜出望外。把江青叮嘱要保密的话丢在脑后，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在武汉的其他军区领导。那些人又把这“北京来电”公开了出去，大字报贴了满大街。中央文革的眼线遍布全国啊！都是打着某报记者站的名义，第二天即20号，就把情况捅上来了。江青闻之大怒，收回了先前的承诺，责令陈、钟撕掉笔记本上的有关记录。所以，没有等到戚本禹接见武汉的造反派，这几条“共识”就作废了，仅生存了不到3天。

陈、钟4月底回到武汉，形势与其走时已大为不同。保守派和东山再起的造反派都在进行全市“大联合”，武斗日渐升级。67年6月底，我和另两位同学扒火车去东北，在郑州一上车就碰到几个武汉的学生。他们说武斗死了不少人，用长矛直接捅，十分恐怖，他们都是逃出来避难的。

（二）武汉“7·20事件”爆发

第一小点：毛泽东亲自出马

毛泽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要到武汉去的。自从1966年7月毛回到北京，撤了工作组，召开了“8届11中全会”、炮打了刘少奇的司令部，然后是批判“资反路线”，8次接见红卫兵，号召全国夺权，击退了“二月逆流”……已经整整一年。可以说“坚冰已经打破，航线已经开通”，他可以放心的离开北京了。

毛虽然声称要到武汉去“保陈再道”，但我认为毛还另有目的——就是把北京留给中央文革，放手让康生、江青等人从肉体上折磨、摧残刘少奇，而他本人则“不在现场”。甚至还可以装模作样批评几句，事实上他也真这么做了。因与今天的主题无关，不展开讲了。

但毛大大低估了解决武汉问题的难度。自以为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，“金口玉言”一出，各方还不得“热烈拥护”、山呼万岁？毛的解决方案大体上有几点：

一是武汉军区支左支错了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，要做检讨；二是解散工总是错误的，应为其平反；三是武汉“二司”、“三新”等是造反派；四，“百万雄师”是保守组织等等。这和4月份曾经达成的“共识”已经是天渊之别了。

如此巨大的落差，陈再道根本不能接受，还和周恩来拍了桌子。无奈，周只有领陈、钟去见毛。毛说得很轻巧：犯路线错误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现在到处都是方向路线错误，检讨一下就完了嘛！一看这是毛的意见，陈、钟再不通也不行啊！没法子再往上打官司了嘛。但心里还是不服气，弯子根本就转不过来。

陈再道、钟汉华口服心不服，部队的中下级干部——由于支左和各企业的“百万雄师”已经有很深的关系——心不服口也不服。

第二小点：“720事件”爆发

此时，武汉爆发危机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，只差一根导火索，而王力恰恰把导火索点燃了。他做了两件事：一是送周恩来回京，从机场回来就直接到造反派中，透露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。造反派如获至宝，把王力讲话的录音到处广播。二是王力在随后的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，口出狂言：“你们这些师以上干部，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，像小学生一样，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，从A B C讲起……”

说起来，王力讲的也不错，这些军人谁能知道毛为何要发动文革？目的是什么？问题是，台下这些老军人都是一批久经沙场、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，在他们眼里——你王力算老几？不就是一个摇笔杆子的“秀才”吗？一丝战功未立，跑到这儿来教训起我们了？

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，直接导致了“7 2 0事件”的爆发——7月20号凌晨，部分军人冲进王力所住的宾馆，要和王力“辩论”。王不敢出头，后来看谢富治、陈再道与那些人谈得不错，就壮着胆子下来。恰逢又有一拨人冲进来，还错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，上去就是一枪托。陈捂着脑袋大骂：妈那个巴子，老子是陈再道！这拨人强行将王力架上汽车，拉到军区等处“辩论”，实际上就是批斗。

因为王力住处和毛相邻，群情激昂、冲进宾馆的军人让毛非常紧张，以为发生了兵变。汪东兴下令随行的8341部队子弹上膛，架起机关枪，随时准备开火。实际上，除了陈再道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，没人知道毛就在武汉，更不知道毛就住在旁边。

事情传到北京，引起一片慌乱。都认为武汉发生了“西安事变”。周恩来二话不说，立即返回武汉。江青一度要模仿“西安事变”时的宋美龄，深入“虎穴”，但最后还是没去，而是和林彪联名给毛写信，委托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信使，“头在信在”，必须亲手面交毛。毛泽东自己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，怀疑是陈再道和“百万雄师”策动的一场“叛乱”。

7月21日，在周恩来、杨成武等人的安排下，调动毛的专列故布疑阵，声东击西，而毛本人则破戒乘飞机逃往上海。

（三）“7 2 0事件”后的极左狂潮

第一小点：毛泽东的看法

尽管“7·20事件”并不是“西安事变”——毛毫发无损，也没有人限制毛的自由，但确实让毛丢了面子。周恩来在事件发生两天后说：“主席很生气，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，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……”！（徐海亮《7 2 0事件在文革中的位置》）

事件后，毛最初的看法是部队问题严重。他给江青的信中说“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”，毛提出“大量武装左派”。江青也借“河南一个群众组织”之口，提出了“文攻武卫”的口号。在这儿有必要提一下，这个口号的“专利权人”就在我们群里——袁庚华先生。他多次说这个口号是他提出、后被江青采纳的。至今也没有看到任何人来和他争抢，应该就是他的“专利”了吧？

毛提“武装左派”，就没想到，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“左派”。军队肯定认为自己支持的是“左派”，或者直接发枪，或者明抢暗送；对立面也自认为自己是“左派”，你不给我发，我就自己去抢！接下来的武斗就从棍棒、长矛迅速升级为步枪、冲锋枪、手榴弹。江青

鼓吹“文攻武卫”，谁都称自己是在“武卫”呀！每次和外国开战，不都是说“自卫反击战”嘛。兵法上也说“以攻为守”、“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”——“武装防卫”和“武装进攻”在实际执行中没有、也不可能有什么区别。

第二小点：大抓“军内一小撮”

7月22号，周恩来营救出王力。北京举行盛大集会欢迎“谢富治、王力光荣回到北京”。为了拔高规格，王力所乘飞机先到但不降落，在北京上空盘旋，等周恩来的飞机落地，加入欢迎王力的队伍。王力受到了“英雄凯旋”般的礼遇。

7月25号，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，声讨武汉地区“党内、军内一小撮”走资派，庆贺谢富治、王力胜利归来。原本不打算参加的林彪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蒯大富和韩爱晶说：从前我们要做文章，但没有题目，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，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。

蒯大富还问王力：“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？”王力连连点头，点名徐、叶两帅，点了南京、福州两个军区，说毛主席、林副主席对他们不满意。

蒯大富、韩爱晶会后立即召开“清华井冈山”和“北航红旗”两总部的联席会议，蒯大富在会上说：“林副主席做接班人，有好多人不服，主要是四方面军的，他们力量大人多，高级干部多。‘720’事件就是四方面军陈再道搞的，后台是徐向前。林副主席提出的‘带枪的刘邓路线’就是冲这些人来的。林副主席对我说要做大文章，就是要揪‘军内一小撮’，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，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。”

7月27日，林彪主持会议，决定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。杨成武回忆道：“在这关键时刻，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：‘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，而是全国性的问题’，提出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’，要批判‘带枪的刘邓路线’，‘揪军内一小撮’……”（《杨成武将军自述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，第294页。）

同一天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明确提出，“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”！

8月1日，各报都转载了《红旗》杂志12期社论《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》，社论写道：“不久以前，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。”“目前，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、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。这是斗争的大方向。”《红旗》杂志1967年第12期。）

在连篇累牍的舆论轰炸下，各地造反派都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，把“军内一小撮”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“新阶段”、“第三战役”，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。因此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，大肆抢夺武器弹药，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进一步升级。

外事口造反派也乘“720事件”后的乱局，组成千人“揪陈大军”，在外交部门口“安营扎寨”。8月7日晚，戴着英雄光环的王力，约见外交部“革命造反派联络站”代表，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。

8月19日，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多次批评、警告，宣布“夺取”部党委大权，将副部长姬鹏飞、乔冠华关押在地下室，每天强制他们到王府井闹市卖造反派的小报。这两个人大部分外国记者都认识啊，外电评述：外交部夺权，意味着周恩来政府的彻底垮台。

也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文革即将进入“新阶段”——也就是大揪军内一小撮的阶段，老造反派要立新功，以前揪地方干部落后的，也希望借此机会赶上之时，突然传来了王力、关锋被抓的消息，传来了毛在王力“8·7”讲话上批“大大大毒草”和《红旗》杂志12期社论上批“还我长城”的消息。当时我恰好在北京，以为是谣言。王力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，又刚刚在“720事件”中获得殊荣，怎么可能会抓他？直到消息被证实，还不敢相信。

（四）促使毛急转弯的背后因素

第一小点：武斗急剧升级，全国几成武斗战场

我们仔细品味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决策，发现与文革前绝然不同。毛惯于一般号召，缺乏实施细则，不具操作性。比如号召解放军“支左”，却没有“左派”的标准；“军委八条”，没防止军队滥抓；出个“10条”补救，却又导致各地造反派冲击军队首脑机关，抢夺武器弹药等等。可能与文革前的刘少奇等人善于将毛的一般号召细化，使之具有操作性。打倒刘邓后出现空缺——毛是“甩手掌柜”，林彪则奉行“毛主席划圈我划圈”，中央文革一干人更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。

在“武装左派”、“文攻武卫”口号下，全国各地硝烟滚滚，枪炮不断。广西抢夺援越物资，连苏联过境的援越武器也不放过，屡屡引起苏、越抗议；四川“三线”兵工厂多，不用抢军队的，直接去工厂仓库、甚至生产线上拿。

毛的武汉之行非但没有抓出指导全国的“典型”，反而引发了武斗大升级，全面内战开始。

第二小点：政府失控，火烧英国代办处

各部部长早就打倒得差不多了，周恩来都不得不替吕正操当铁道部长，亲自过问运输、车皮这样具体的事项——事关国计民生、百姓生活。但，还总能勉强支撑下去。但外交部被夺了权，影响就大了。

中国的外交原本就左，文革开始夺权时，周就一再告诫，外交政策一直是毛主席掌控的，外交大权不能夺，造反派只能监督。陈毅因“二月逆流”靠边后，造反派的发言权越来越大，很多事情姬鹏飞、乔冠华不敢顶啊！驻外使馆也都夺了权，大使被打倒，工人或级别很低的外交人员当权，使馆有活动都是他们出面，让外国元首感到受了侮辱——不对等啊！至于随意拦截行人，强行发放“小红书”等荒唐事情就更多了。

“720事件”之后，极左狂潮达到顶峰。外交事件频频发作，发生了冲砸印度、缅甸、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的行动，但以“火烧英国代办处”最为激烈，影响也最大。

这件事的起因在香港：大概在67年的4—5月份香港左派开始模仿大陆搞文革，遭到港英当局的镇压，冲突日趋激烈。三家左派小报公开鼓吹自制武器或抢夺警察枪支，被当局

查封。一次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，遭香港警察阻止；中方民兵越界支援，也被港英警察包围。中方边防军为援救民兵，开枪打死了数名英国警察。

此事经新华社报道：港英当局打死打伤群众数百名（事后证明死一人，伤几个人），《人民日报》冠以“血腥屠杀”字样，激起国内狂热反英风潮。造反派掌权的外交部直接向英国政府下达“最后通牒”，要求48小时内释放被抓群众，解封被禁的左派报纸。港英当局没有理睬“最后通牒”，派驻港英军进驻警署取代警察，早先还调来了航空母舰。

8月22日，48小时到期，看英方没有答应条件，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造反派，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砸一通，还不过瘾，干脆放火烧了英代办处。周恩来闻讯大惊，立即派卫戍区增援，并出动宣传车告诫好人撤离，留下的是坏人，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睬。倒是英国代办听到广播后，主动带领多名工作人员寻求卫戍区的保护，还有7、8名工作人员翻墙逃出，到外交公寓和芬兰大使馆避难。

第三小点：军队失控，有分裂的苗头

文革开始后，已先后有北京军区司令杨勇、政委廖汉生被批斗关押；海军副司令、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死得不明不白；武汉的陈再道、钟汉华又遭难。各地军头无不忧心忡忡。

“720事件”之后，报上大肆鼓吹“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”、抓“军内一小撮”。地方干部抓“党内一小撮”，已经让多少人家破人亡；现在轮到了抓“军内一小撮”，前景不寒而栗。

恰在这个时候，名满全国的造反派蒯大富、韩爱晶在林彪的暗示下，又挑起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旧怨，要揪陈再道的后台徐向前元帅，还组织抄了徐帅的家。江青、叶群合谋抄了四方面军另一重要将领徐海东大将的家，大有把四方面军将领悉数打倒的趋势。出身于四方面军的将领更为紧张，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干脆擅离岗位，躲进大别山深处。

一、四方面军原本就有很深的暗伤。毛虽然一再强调要搞“五湖四海”，其实最偏重一方面军。49年以后，无论是海军司令、空军司令、总参谋长乃至国防部长，无不出自一方面军。其他“山头”只能任副职。延安时期四方面军的丁武选曾在大会上痛诉所受不公正待遇，引发会场上一片委屈的哭声，好不容易才压了下去。如果此时再撕开旧伤疤，整个部队就不是去支持毛打倒刘少奇了，闹不好还引发一、四方面军火拼，这是毛泽东所绝不能允许出现的。

第四小点：周恩来的适时出击

进入1967年，周恩来逐步有了危机感。2月下旬，江青抓住周一点疏忽，指责他“目无林副主席”；“二月逆流”有人指称周是后台；中央文革戚本禹公然把周排除在毛的司令部之外；江青也当面称周为“旧政府留用人员”。进入5月份，神秘组织“516兵团”在中央文革默许或纵容下，宣讲周“是毛主席的同路人”，“是（毛和刘之外）第三司令部的人”。他们到处散发反周传单，张贴反周标语。

此时，江青又抛出了“伍豪启事”，在周头顶悬上一把“达摩克勒斯之剑”。有人说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你不是叛徒，怕啥？说这话的人是对那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太不了解了。看过一个资料：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曾在叶剑英面前发牢骚：说我是这，说我是那，他们有证据吗？叶帅叹了一口气：如果需要证据，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了。

周恩来知道，某些造反派如“516兵团”把矛头对着自己，以及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，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的影子。“不停顿地打倒一切”，导致全国性的混乱已经无以复加，总根子也是中央文革。而稳定北京乃至全国的局势，就必须对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某些措施，但没有毛的首肯显然不行。

周恩来隐忍不发，他在等待。“火烧英国代办处”为周的反击提供了最佳时机。我甚至都怀疑是周有意为之——听任夺了外交大权的造反派犯错。他知道，外交上的严重混乱，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。眼看条件成熟，周抓住机会果断出击。

8月25日凌晨，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总长杨成武，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。周特别指出王力的“八七”讲话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，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，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，宣传上又提出“揪军内一小撮”。他愤慨地说：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”周还把一份王力“八七”讲话交给杨，要他转送毛泽东看。

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周掌握的时机可以说恰到好处。毛泽东仅思考了一个晚上，即做出了反应。他在王力的“八七”讲话上批了：“大、大、大毒草。”在《红旗》杂志12期社论《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》上批道：“还我长城”！

第二天即8月26号，毛令杨成武立即飞返北京，直接向周恩来传达：抓捕王力、关锋，（戚本禹暂且观察一段时间）追究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责任。周迅速召开“碰头会”，传达毛的指示，现场对王、关采取措施。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令中央文革措手不及。陈、康、江一个个忙不迭地推卸责任，嚣张的气焰大为收敛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□ 来源：《文史讲堂》微信群

~~~~~

## 【往事非烟】

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

• 江畹铸 •

我的伤口，我自己来舔，不要大家为我呻吟……

当我看到纪念和回忆郭世英的文章时，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。多年来，我反复这样对自己重复，除了自己的家人，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，因为这是我永久的痛。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：“耗子要是得意了，那么猫儿一定会有冤屈。”他是用四川话说的，那声音，那语调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，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。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，也许他是有感而发。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，至今对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。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，作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他的一个朋友来说，也有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，记忆错位的事情，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，留下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。现在是时候了，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开，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。



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度过的，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。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，我有幸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有些交往，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。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，记不太清楚，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，可能就是5月，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。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，我们都是四川同乡，用四川话聊天。正聊着，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突然也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。我抬头看，是个男同学，颧骨较高，眼神和蔼，岁数可能比我们都大。我们就好奇地问：“你也是四川人？”他说：“对头！”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边吃边聊，但谁也没有问他的名字。后来，几次吃饭的时候，他都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，瞎聊，知道他叫郭世英，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。

一天，我在校园里碰到他，他笑着和我打招呼，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。这让我好奇，就问他：“你是四川人，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？”他说：“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。”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了：“你老家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乐山。”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，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，就开玩笑问他：“哦！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了。”他突然有点不自然，说：“我们那里郭姓很多，大概吧。”也就这样，我们有一搭无一搭聊了会儿就分手了。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，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他对人很亲切，很诚恳，但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。

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，文革开始，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。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大字报，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，让我吓了一跳，赶紧看。这才知道，他是郭沫若的儿子，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，当时我就懵了。

我是凡人，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，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，跟着大家一起折腾就是。我也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，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。（其实我和他也就是那样吃饭说过几句话，在校园聊过几句而已。）

但我还是常常见到他，在食堂或在校园。他好像很自觉，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，独自一人手捧一个大饭盆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，和谁也不打招呼。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，他对我点点头，我假装没看见，擦身而过，表示和他划清界线。

大串联开始，我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四川（我家在宜宾），回京时我在郑州下火车，打算转车去看我的一位亲戚。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，我的钱包被偷。不过我并不慌张，那时串联红卫兵走到那里都吃住不要钱，乘车也不要票。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，也要有一段时间，何况经验告诉我还要大排长龙。我肚子咕咕叫，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。而亲戚家在许昌，一时也到不了，再说人多，根本挤不上火车。我有点犯愁，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发愣。我这人特别没主意，尤其一个人在外。

“这不是……梅，什么梅？”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这么问我。我一抬头，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低头看着我。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，有点警惕。我站起来，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，那双眼睛是真诚和蔼的，这是？哦，是郭世英！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我心里问，嘴里说：“怎么是你呀？”他笑了笑：“你一个人？”我点点头。他又问：“同学们呢？”我说，就我一个人，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。他哦了一声，说：“那我就走了。”此时，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动学生的身份，叫住他：“你怎么到郑州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要饭了？”他把一个提包丢在地上大笑起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，笑得非常天真。他说：“虽然我是那个，但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。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。火车只到郑州，正想找去那边的火车呢。”他还告诉我，文革开始，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，但行动还算自由。现在大家都串联，顾不上他了，他就趁机跑了出来。

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，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。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，还没吃饭，就说：“我也没吃饭，走！填饱肚子再说。”我有点犹豫，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。饭后，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，塞到我手里：“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。我不会难为你，省得被我连累。”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，那样的不是个东西，于是我也站起来，和他一起走出饭馆。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：“你去哪儿？不管我啦？！”我那根“阶级斗争的弦”再也无法绷紧。他站住，望着我说：“我要赶火车，去洛阳那边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去看朋友。”我说：“我刚从那边过来，全乱套了，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了，车厢里满是红卫兵，火车趴在铁轨上不动。”听我这么说，他显得很沮丧的样子，一脸无奈。他想了想说：“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。”也只好如此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感到孤独的恐惧，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。在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，我们排了很久的队，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涂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。

晚饭后，我们从食堂出来，郭世英问我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我说也好，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。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，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。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，在他眼里，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，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。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，在那个特殊的时刻，在那个特殊环境，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（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，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），他那特别有磁性（借用现在的术语）的谈吐，让我毕生难忘。我把那次我们的交谈大致整理了一下，时间过去那么久，我们当时聊天的原话肯定不能重现，但意思是不会错的，可我不想用那个“”（引号），因为引号内的，常被认为是原话。

他问我，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，有什么看法？

我老实地告诉他，看过，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。

全是那个X，他告诉我。

这个我知道，大字报揭露的，我说，X代表赫鲁晓夫，说你们学苏修，鼓吹修正主义。

不是！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，很愤怒，很激动。他说，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，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，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边。

我问，那X是什么意思？

他说，学过代数吧？未知数的符号。我们几个同学，探讨未知。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，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？我们太天真了，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。

我问，那你说怎么错了？

他所问非所答地说，揭发我的大字报，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，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，哪有这回事？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，写点文章、诗、杂文什么的，相互传着看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集团了，还反革命了？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，不值一提，都应该一把火烧掉。因为我认为，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。

我希望他具体谈谈。

他说，我过去有一个观点，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，强调独立的人格。我曾经对人说过，“生应为人杰”。我写过一篇小说，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，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，解救被罪恶吞噬的人们的灵魂，可笑吧？你以为你是谁了？救世主？后来我到河南农场，和土地庄稼在一起，思想彻底改变了。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，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。

我问，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，怎么到农大来了。

他说，这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，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，不仅思想而且自身。他反问我，你怎么学兽医了，这不适合女孩子的。

我叹了口气说，没办法，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涂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？不过也好，来北京了。学了半个学期，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，有很多有名的教授。我特别爱遗传学，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，这里X太多了。

他立刻说，别X了。谈点别的，知道孟德尔吗？

我说，知道，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，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？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。

他笑了，说，看来还真懂点。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，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，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。我学植物，你学动物，其实本质一样。孟德尔不一定错，米丘林未必对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，苏联是修正主义，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。

他说，我也没全盘否定，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，他是神父，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。

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，听他慢慢道来，我觉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。

我说，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，好像很难找。

他说，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给你几本。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，可以请教他们。

我说，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

话题又回到X。

我问，大字报还说，你们要偷越国境，有这事吗？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告诉我，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。他说，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，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。上大学后，各奔东西，不过谈得来，就又常在一起了。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，但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，但没有行动。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，说想出国，又口无遮拦，结果有人告密，我们就犯事了。

我问，那怎么处理你们的？

他说，情况不同，分别处理的。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，两个男同学劳改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，这次串联出来，我就是要到那里看看。

我问他，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，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？

他说，砸就砸了吧，虽然可惜，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

我们又聊到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这幅有名的对联。

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，问他怎么看。

他说，太没意思了，这还值得讨论？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？照这么说，历史还能进步？！荒唐！从对联他又聊到“联动”。他说“联动”的性质和满清的“八旗子弟”一样，自以为血统高贵，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。这才叫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，没有好下场。

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。（那时，遇罗克的《出身论》我们还没有看到，但郭世英和后来的《出身论》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。）

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，非常随意，我开始的拘束已经荡然无存，我觉得他不仅健谈而且思想很敏锐。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，恰恰相反，他是一位有思想，有理想的青年，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，我开始对他产生亲和感，很愿意听他给我“摆龙门阵”，虽然话题并非轻松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回到招待所，各自休息不提。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，还算幸运，在郭世英的帮助下，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。他要往洛阳方面走，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，就匆匆转身离去，消失在人群里。

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，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，在农大的校园。那天我正埋头走路，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，我回头，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。我挺高兴，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。他说，到农场看望朋友后，又骑自行车南下，到了武汉等地。自行车坏了，就步行串联，后来又回到农场呆了些日子。他问我什么时候从河南回北京的。我告诉他，离开许昌我也没回北京，我也南下，到韶山、广州、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。走着聊着，恰好到男生宿舍。他让我等他一会儿，跑着钻进宿舍楼。很快他又钻出来，手里拿着几本书，递给我。他说，这是几本有关遗传学的书，拿去看吧。我拿过来看，有方宗熙写的《生命的进化》和《普通遗传学》，还有吴仲贤翻译的《生统遗传学》。我这才想起那次我们在郑州聊天时，聊到什么孟德尔和米丘林，他说回北京要找几本有关的书给我看。我没当回事，以为他说说而已，而郭世英一直记在心间。拿着书，我觉得很惭愧，很感激他，但没有说出口。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认真，对人很热诚。

1967年，郭世英是否离开过北京，我不很清楚。我6月回过宜宾一个月，其它时间都在北京，我常在校园里和郭世英相遇。我开始称他为大郭，他则叫我小梅，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。后来有意或无意我称他大哥，他叫我小妹，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。因为在四川话里，大郭和大哥，小梅和小妹的发音是相同的，彼此称呼，你怎么理解都可以。我只想说，我们回北京再见面后，我觉得他真像一位大哥，见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。而他也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，听话的小妹。我们常在一起聊天，如果说我们郑州那次不期而遇，彼此都不了解，他对我说的那些多少有些谨慎，或有言不由衷的内容。现在（指1967年以后）我们就自然而无拘束，因此我认为这才是郭世英的心声。因为很随意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比他小好几岁。我曾希望他什么时候带他的女友过来和我见见面，他说，顺其自然吧。他还说，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一是需要为她付出，二是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，缺一不可。而作为他的朋友，只有他的付出，而不必让他们为他烦恼。我没有弄懂，他说这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

我们聊天时他还说过，他上演的是一场悲剧，高中是他的悲剧的序幕，北大是他的悲剧的正剧，也许悲剧将在农大落幕。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他也没有很好地解释，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心里被难以拨开的黑云笼罩着。不过，他也断断续续和我聊到他在中学和北大的经历，说实在应该是心历。

他说，初中他在北京四中，毕业他没有考好，落榜了，在家里玩了一年。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，大学他先是在国际关系学院，62年转到北大哲学系。101中的同学单纯、北大的同学沉闷而农大的同班同学冷漠。单纯可爱，沉闷可悲，而冷漠最可怕！高中，非常完整的三年。同学们都没有心眼，相互之间从不猜疑。我要求上进，也得到回报。但我心里真正追求的和学校倡导的有矛盾，这让我痛苦，而这种痛苦在高中毕业后达到顶点，以至让我神经衰弱得无法学习。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让心里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的探索，就转到了北大的哲学系。谁料这个新的环境就像“是一沟绝望的死水，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。”让我非常失望。同学中也有几个有思想的，但火焰各自燃烧，甚至我烧你，你烧我。只有和原

来中学的几个同学在一起，我才感到我们的火可以和他们燃成一炬，当然我们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。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肉体的磨练，我终于明白我们过去的荒唐和幼稚。本来我不打算再上学，就在农村呆下去，但还是来这里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下定决心，要好好学习，从此与过去的我决裂，但同班同学没有一个理解我，我想回到单纯也不可能了，但我相信将来会好的。

上面我写的，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记录，而是很多次交谈后，我留下的总体印象。我认为他的内心很痛苦，又没有办法发泄，多少和我聊了些。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开过心扉，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，我认为会有。

1967年，老实讲农大还算比较平静。各派之间不断地打派仗，我早习以为常。我的出身不好，造反派对我这样出身的都避而远之，我只好当一个“逍遥派”。这在运动初期很难堪，无可奈何。可到了67年下半年，我发现“逍遥”的人越来越多，真的成为一个“派”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“逍遥派”圈子里的人，不问“政治”，有谈恋爱的、有做像章的、有打毛衣的、有养公鸡抽鸡血打针的，更有人长期不在学校，真不知逍遥到何处去了。我没有怎么走动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，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遗传学方面的书外，我还看小说。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了，流落在外不少“封资修”的小说，我也弄到几本。那时大张旗鼓在宿舍或什么地方看，也没人管，人都忙着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，留校的人有兴趣的在斗嘴，没兴趣的各干各的，这种特别自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年底。

郭世英被东方红总部勒令不得离开北京，随时听候批判，但对他的约束并不很紧，他可以跑回家，我们见面聊天也没有人管。

我看过冯骥才写的一本书——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。我在下面要讲的有关郭世英的一件事，其情节和冯骥才书中的第一个故事《拾纸救夫》有些相似。我要详尽叙述的原因是，通过这件事，我感受到郭世英心灵中异常完美的一个侧面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气很热，我正在宿舍里看书，一位同学进来告诉我说，有人在楼外找我。我跑出去一看，是郭世英，他身旁还有一个人，是个女孩，也就十五六岁，很疲惫的样子，他招呼我跟他们走。我跟着他们到花圃旁，找了个地方坐下，他指着女孩对我说，你不能让她在你那里住一两天。我问，她是谁呀？他说，她是从湖南湘潭来的，你叫？那孩子说，我叫罗湘漓。郭世英说，说起来话长，慢慢告诉你。我说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宿舍有空床。郭世英说，那好。我还要再回趟家，小罗你帮我照顾好，我后天一定回来。又对小罗说，你放心好啦，她是我小妹，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。说完掏出些饭票给我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里。

当晚我安排小罗休息，小罗太累了，很快就睡着。第二天，我才有机会听小罗原原本本说事情的由来。

小罗说：我父亲是湘潭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，那个地方砸四旧，破封资修，连手表都不放过。父亲有一块老牌的欧米伽手表，造反派让他交出来，他舍不得，就对学校的造反派头头说，手表又不是封资修的东西，主席也有手表。那头头说，你污蔑伟大领袖，你拿出证据出来。父亲就说，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，郭沫若见主席没有手表，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来送给了主席。那头头一听，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。命令喽罗们把父亲抓了起来，说你罪上加罪，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，你造谣！我父亲说，那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，没造谣。头头让父亲拿出报来，可他到哪里去找，就这样天天拷打，关着不放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偷偷扒火车到了北京，想找郭沫若，救父亲出来。到北京，我还真的打听到

了郭沫若的住所，昨天我就到那里门口站着，想怎么才能进去。恰好，你大哥从门里出来，我不顾一切，哭着对他说，我要见郭沫若。大哥让我别哭，问怎么回事？听我说完，他告诉我，手表的事他知道，确有此事。不过要拿出证据，也要给他点时间。于是他带我到外面吃了饭，先送我到大姐你这里安顿下来。她问我，那大哥是谁呀？这么好。我说，他就是郭老的儿子。小罗一听就大哭起来，说她父亲有救了，我安慰小罗说，肯定有救的，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。

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，他见到我们后，拿出两张照片，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（我忘了是“新华日报”还是“大公报”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）。其中一张是1945年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，另一张照片刊有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。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，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。我们仔细看，就是郭沫若送给主席手表的报道。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，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，是郭沫若的亲笔。郭世英说，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，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，请他马上冲洗出来。回家后，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，我父亲很感慨，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，再次确认他送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。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，交给小罗，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，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不留你了，赶快回去救你爸爸，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。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，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，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，抬头看郭世英，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。

当晚，我和郭世英送小罗到北京站，望着小罗乘坐的火车离开我们才走。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郭世英说，这回你和你父亲可帮小罗大忙了。他说，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，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，但对小罗来说可真是天大的难事。有句话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，我总记在心里，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。其实这次小罗“千里救父”才是应该传诵的千古佳话，我被她感动得两天都没有睡好。罗湘漓，多么美的名字，多好的小姑娘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沉默地望着外面，望着外面那沉沉的夜，没有再说话。

（勇敢的小姑娘罗湘漓后来给我来了信，她感谢郭老和郭世英，说郭世英给他的照片和郭老的亲笔，帮了大忙，让他父亲得以解脱……）

几天后，郭世英见到我，他还想着小罗的事。他说，我估计像小罗爸爸这样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。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，要找什么资料只是举手之劳。不仅能让很多人免于无妄之灾，更能方便我们大众。看来我应该改学图书馆管理专业，这个类似索引的学问太重要了。他又说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点事，我想编一本《鲁迅语录》，每一章专门选录一个题材。还可以编一部《鲁迅著作索引》，如把鲁迅文章中凡是写桑树的，凡是提到嫦娥的，都找出来，分门别类，这样人们要找鲁迅哪篇文章哪句话，不就非常简单了吗？他想马上着手这两件事，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？我当然愿意。他说，我还要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做，这种工作可以分头进行，最后汇总就行了。

那个时候，除毛著外，最容易找到的书就是鲁迅的著作。郭世英给我布置任务了，他让我把鲁迅论“青年”、论“国防文学”等几个专题的话都找出来，抄在他给我准备的卡片上。他还让我想想，如何编《鲁迅著作索引》，在他看来这是比编语录更大的事。我很认真地编《鲁迅语录》，前前后后我弄了近一个月，抄了厚厚一摞卡片，交给郭世英去汇总。我告诉郭世英，要编索引，看来非常困难，不是几个月，也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。他也说，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考虑和实践，我也觉得这事太难。一个鲁迅就这么难，要是想把譬如

“鲁迅”这个名字，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里都找出来，按我们现在的做法，根本办不到。也许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会有一种办法，我盼着。

电脑科技的发展，网络工程的问世，现在郭世英的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，但他没有盼到。当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输入到 Google 里、打入“百度”中，不到一秒钟有关“郭世英”的条目就跃出，分别有 1 4 5 0 0 条和 1 7 3 0 0 条之多！这时我感觉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边，无言地望着他自己的名字，啊！我的愿望实现了，他心里一定这样在想。

我现在马上就要写到郭世英的最后日子。这是我最难和最不愿意再去回忆和触及的。人生最残酷的不过如此，当我以发抖的手敲击键盘时，请原谅我会激动而出现的语无伦次。也不要嫌我啰嗦，因为郭世英的遇难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，我要让人们从农大这个社会的一角，看到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

我们相对的“好时光”到了 1 9 6 8 年就不再。学校的形势变得很紧张，清队开始，批斗臭老九的声势一日高过一日。我们这些“逍遥派”已经不敢再逍遥，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，由学校里、系里或班里造反派头头组织的批判斗争大会和小会，曾经喧嚷一阵的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只有“革命”，再听不到“复课”的声音了。打人的事经常发生，不断有什么人被打死或什么人自杀的消息传出。大概是 2 月份，学校的工会副主席安铁志，实在不能忍受折磨，从关押他的教室逃出，爬上大烟筒顶部，跳了下来，成为当年我听说的学校第一个殉难者。

我想郭世英的处境一定也非常危险。每次见到他，我都要叮嘱他要特别小心，自己保护好自己。他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他可能有某种预感，免不了一场大难，我们交谈不再轻松。4 月初的一天，他告诉我，他们班的造反派命令他，不许乱说乱动，只许老老实实呆在学校，准备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。他说，什么革命群众，就是他们那一帮人。我很担心地问他，他们不是还想翻你的老账吧？他说，看来他们是从我的老问题开刀，另有图谋。你没有看大字报说吗？是谁胆敢把 X 反革命集团的那些人，特别是我就这么不痛不痒处理了？要揪出包庇我们的人。我问，那你怎么办？他说，听天由命吧！小妹，你记不记得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农大是我这场悲剧的落幕。我的意思是说物极必反，我相信悲剧落幕后，我会和你们一样，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，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。

农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，（至于 1 9 6 8 年 4 月以前是否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）革委会掌管学校的大权，学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事，都是由革委会布置。我听说当时掌管农业口的是姚文元，而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那几个文革干将亲自抓农大的运动。我现在想，这些人几次接见农大革委会的负责人，是否曾经说起郭世英的事？是否暗示过他们，要从 X 这个案子处理入手，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所以革委会和他们系里的那些人才有恃无恐，拿鸡毛当令箭，猖狂之极。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郭世英就是在 4 月初在我们那次聊天时，提过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两个人，说他不知道以后再见到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，说些什么才对得起他们。我没有问他，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是谁，但两个很奇怪的称呼困惑我多年，我一直以为是两位职位很高的领导，但我又想不起有什么姓郝的高级干部。当我写这篇文章时，我曾把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分别或单独输入“百度”和 Google 查询，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条目。而我从周国平的《岁月和性情》一书中看到有这样一句：“世英死后，周恩来来到郭家，还曾说了，世英是为我死的，这样一句痛心而内疚的话。”各种资料也表明，周总理确实曾经关注和参与处理 X 这个案件。那么农大的那帮人当年对郭世英下毒手，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，针对周总理的呢？郭世英说过的那个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是否就是指周总理和邓颖超呢？我希望我的猜测能够得到证实。

4月中旬，我们系的副教授刘书芹被关了起来，连夜毒打审讯，要他交待问题。打人的事，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坚份子亲手干，不让外人看的。事后，他们把刘书芹送到我们住的5号楼的地下室，把我叫来，命令我给刘老师的伤口上药，给他吃消炎药。还说，这是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，不能让他死了。每天当我面对遍体鳞伤的刘老师，我难受极了，心里愤怒地咒骂那些混蛋。我更担心郭世英，千万别落到这些人的手里。

一天，我到校医务室，为刘老师拿药，取些处理外伤的纱布药棉。在排队取药的时候，我听前面两个人很小声地说，我们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来，晚一步他就投敌叛国跑了。还说，正在审问，他嘴硬得很……我一听，头嗡的一声，眼睛一黑差点摔倒，扶着墙，强作镇静，想继续听他们说。他们似乎发现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就不再说些什么。我最怕的最担心的事，到底发生了。

我走出医务室，坐在医务室的台基上发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说过，我遇事特别没有主意，就这样不知坐了多久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想，最重要的是赶快搞清楚郭世英现在被关在哪里？设法和他见见面。我站起来，在宿舍区，在教学区还有校园到处乱转，希望能发现点关押郭世英的线索。我还跟踪了他们班的人，可是没有结果。看来，这次他们对郭世英采取的行动是有计划安排缜密的，很可能就是校革委会一些人组织的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郭世英现在的状况就更糟糕了。

那时农大校园的许多建筑物包括家属宿舍，都关押着众多所谓的牛鬼蛇神，和称为反革命分子的无辜群众。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和自杀，看管得相当严，要想从中找到郭世英，谈何容易！我个人看来没有这个能力了，我想起一个老乡，他也姓郭，畜牧系的饲养员，出身好运动积极，被系里三结合到革委会里了。从我平时对他的了解，他还算有良心，看不惯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为。我对老郭说，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抓了，我想见见他，问能不能帮忙。老郭问了问情况，犹豫了一会儿说，我想想办法，我不知道这事，要先打听他被关在哪里。他让我等他的消息，晚上在食堂门口见。

离开老郭那里，我回到宿舍，心乱如麻。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，六神无主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干脆还是到食堂门口等老郭去。

我到食堂门口，在那里等了好久，总算把老郭盼来了。我焦急地问怎么样？老郭说，他打听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关在教学楼里，今天下午又转移了，具体什么地方他不清楚。原来郭世英已经被他们抓来有两天了，如果不是在校医室偶然听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问老郭，郭世英有没有挨打？老郭说，怎么没有？！他说，虽然我没有见到郭世英，但听他们透露说，怎么打他，他都不说话。老郭这么一说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老郭说，别哭呀！哭管什么用，我都见不到他，你也别去找他了。你说他是郭沫若的儿子，你不如去找郭老，没准会有救。听老郭这么，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罗湘漪。对呀！我怎么没想到向小罗那样？我应该去郭老家，把消息告诉他呀！会有救的。我谢过老郭，忙回宿舍取些钱，准备进城。

谁知这时来人，催我去地下室给刘老师换药，我这一天，昏昏沉沉的，只想到郭世英，把刘老师给忘了，我匆忙到地下室。看到刘老师的伤口又多了几处，旧的伤还化了脓。我心里一边骂那帮家伙，一边骂我自己，我没有来及时给刘老师吃药和换药。我这是怎么啦？郭世英和刘老师都是受难者，我不应该顾此失彼。我静下心来，为刘老师处理了伤口。我求监视我们的那个同学，你们就手下留情吧，再这样折磨下去，他可就危险了。那同学看没有别人，就悄悄对我说，我没有打他，我也恨他们，但他们就是不放过他呀。我坐在刘老师身



边，见刘老师双眼紧闭，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。突然，我听刘老师轻轻地问我：“几点钟了？”我没有手表，看守我们的同学说，12点都过了。刘老师又问：“今天几号？”我说：“4月21号，哦，应该是22号了。”1968年的4月22日，那一早一晚将要发生的两件事，让这个日子铭心刻骨！

刘老师再没有说话，好像睡着了。我回到宿舍，不知道时间，只知道太晚了，根本没有公共汽车，只好等一早再进城，去郭老家。

天一亮，一套例行程序走完后，人们散去，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门口走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许多人往6号楼那边跑，隐隐约约听说，有人跳楼了。我没有随人群拥向6号楼，一则，我有要事进城。再则，这种事从2月份安铁志自杀开始，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，不是我麻木，而是不忍，不忍去看，也不忍去听。早上乘车的人多，又是星期一，我在公共汽车站耐心等着。这时就听新到的，一位来等车的人说，刚才又有人跳楼了，听说是郭沫若的儿子。郭沫若的儿子！我一听顿时傻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在那里一动不动站着。车来了，大家蜂拥上车。车走了，车站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到学校了，也忘了我是怎么把脚步移到6号楼的。楼外还有许多人，七嘴八舌低声议论着。从人们的低语中，我知道就是刚才，大约还不到半小时，郭世英遇难了。大郭，我的大哥，他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不敢走过去，不敢再往前看。我分开人群，走向自己的宿舍。宿舍里空无一人，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里，放声痛哭。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！想起我们最后的那次见面，他告诉我，他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。这个愿望不很宏伟，也不浪漫，但很现实。是他从苦难的经历中最终自己选择的，他为什么要放弃？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！虽然他最后在农大的日子非常险恶，像是要越过激流。但他见到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，就跳上去，见到另一块，再跨上去。他就这样涉足，已经快到彼岸，他为什么要跳到水里去？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！他的女友在等他，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等他，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，他的朋友包括我这个小妹也在等他。他曾经告诉过我，他的弟弟去年的死，给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，他的生命对他的父母来说，有多么重要，难道他会自己去结束它吗？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！面对那帮恶棍和匪徒，他有思想准备，他对我说过，听天由命吧！我想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就是被他们折磨死，他也要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为人的道德准则。

我在痛哭一场后，揭开被子。我对自己说，不行，我得出去，我要尽可能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要不就晚了。

我走出我住的5号楼，看到还有人围在6号楼周围，有些好像是警车的车辆停在楼前，有人守在那里不让人们走近。我走来走去，打算通过群众的议论，发现目击者。但虽然议论纷纷，我始终没有听到一个有价值的声音。

我又回到宿舍，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在说着对面楼里今天发生的惨剧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尽管除了我之外，别的同学都和郭世英没有什么交往。这时一位同学说：“我们楼上畜牧系的一个同学亲眼见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……”我马上问：“谁看到的？”那同学说：“就是那个领我们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学。”那位同学我知道，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，不过不清楚名字。于是我上楼，在四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学，她姓李。我直截了当问：“听说你看到了郭世英坠楼的过程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她也很爽快，说：“不是我亲眼见到的，我当时不是在领舞吗？刚结束，我们在楼侧怎么能看到？是她。”小李指着旁边另一位女生继续说：“她是我中学同学，现在在航空学院（或化工学院，我记不很清），昨天来的，晚上就住这里了，她看到的。”我就请那位外校的同学谈谈经过。肯定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说过，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。

她说：“今天一早，你们都去早请示，我是校外的，没下楼。广播那么响，我也睡不了啦，起来望着窗外梳头，面对的就是那座楼。”她用手指了指，知道她指的就是6号楼，和这座5号楼外形结构都一样。

她继续：“我正梳着，突然看见对面楼靠左边一点有个人往下掉，肯定是人，头朝下，一下子就砸在地上，发出很沉闷的响声，因为下面有树挡着，我没有看见砸在地上的样子。我吓坏了，下意识往上找，就看四楼窗子开着，”

她让我看那个窗口，那窗口和我们现在的位置一样高，稍斜向我们，还是敞开着。她说：“别的楼层没有开窗的，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两个人影，那么一晃就没了。”

我急忙问：“确实有人影？”

她说：“没错！本来我以为人是从楼顶上掉下来的，我眼睛那么一扫上去，就看那扇开着的窗里人影一晃，一晃就没了。肯定那人就是从那窗口掉下来的。是里面的人给他推下来的，还是他跳下来的，我没看到。整个过程也就二、三秒钟的样子，吓死我了。”

旁边小李这时说话了：“我当时随着人群往出事的地点跑，还没到那里，有同学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，拉着我就走，说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别去看了。我问她，谁呀？掉下来的？她用手捂着嘴说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手还反绑着的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

我又问了一些情况，走下楼再回到自己的寝室，零零碎碎的画面在我的脑子里晃动，让我欲哭无泪。

一般来说，女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男生差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无法冷静地把同学们说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联系起来，对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分析和判断。多是从郭世英的个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杀，而是被害，但又理不出一个头绪。

一天下来，我不知道怎么过去的，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脑子里忽闪忽现外，就记得我还要给刘老师上药，别忘了。我一天哪儿都没去，晚上我像往常一样，去地下室。可今天很异常，有人把守下去的门，让我回去。我争辩说，是你们让我来给刘老师上药的，怎么变了。他不听我解释，说让你回，你就回，哪有那么多话！

我只好回宿舍，心里想着刘老师，要是今天不换药，他伤口肯定会恶化。我这一天身心俱疲，迷迷糊糊躺在床上。也不知何时，就听耳边有人说，又死人了，刘老师自杀了！我以

为是做梦，一下坐了起来。睁眼看，是同学在床边。我急忙问：“谁？刘老师，刘书芹？”她点点头。

1968年4月22日，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！我不能再写了。

#### ◇ 后记

事情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也沉默了这么多年。这几年，关于郭世英的回忆文章又多了起来，我想原因之一是，人们在新的时代发现了郭世英生命闪光的价值。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看到的有关文章，也很关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发的官司。郭世英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。我现在回想一下，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，不能说重要得影响了我的一生，但他是让我最怀念的人。我们有过近两年的交往，那么多年过去，他的音容宛在，可见他人格的魅力。我后来从事了遗传学的科研，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响。而他对我说过的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这句话，也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。

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郭世英的死，他死得蹊跷。说他是自杀的，我认为根本不可能。面对强加于他的“自绝于人民”的结论，我愤怒，但我当时只能以沉默来面对那颗“霸道和强权的钢印”。现在，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，多年的科研实践，我的逻辑思考能力比以前强了许多。我冷静地思考，把那天听到、看到的一切综合起来，我敢肯定，郭世英的死，是谋杀而不是自杀。

我是这样推断的：那位北航（或北化）同学看到郭世英坠楼瞬间，四楼窗口有两个人影一晃就消失，这个情况非常重要。如果郭世英是自杀，当时的屋内会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无人，郭世英跳了下来，这样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。如果有人影，也是事情发生后，看守者发现，跑到窗口，往下观察，而这个过程再快，也要几秒钟，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间。二是有人，郭世英往下跳，看守的人会立刻跑到窗口，去拉他，但没有拉住，郭世英跳下去了。他们会很惊慌地站在窗前，往楼下张望。这个过程怎么说，同样也会持续几秒钟，然后他们才会掉头往楼下跑，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，这不符合常理。这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没有出现，那么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杀。逻辑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简单了，郭世英是他杀，是窗口后的人，起码两个人，他们把郭世英抬上窗口，然后把他推下去。为什么两个人一晃即消失，唯一的解释是，他们怕人看见，因为他们是杀人犯！

再来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，跳下去的。我以为根本不可能。郭世英的手被反绑着，这不仅小李的同学看到了，各种文章也都提到了。反绑着的人，即使是身体很强健，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，也不可能“升起来”，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处，还能再用反绑的手拨开插销。试想，这时他身体的位置在何处？虽然我没有去那个房间，不过这几座楼的结构都一样，那窗台只有几厘米宽，他能在上面稳住吗？更何况郭世英浑身是伤，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经让他奄奄一息，也正如一些文章写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要完成几个高难动作才有可能从窗口载下去。他又不是超人。而我更以为那天早晨，他们又对郭世英毒打，或者把他打死了，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气。他们到底还是心虚，就把他从窗口推了出去，造成自杀的样子，逃避罪责。

最后来看那些暴徒绑架郭世英的目的，说他是想投敌叛国，这是抓他的借口。真正的目的是想撬开郭世英的嘴，得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抓幕后“包庇者”的不可告人的阴谋。如果目的达到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满天飞，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方面的什么新闻出现。可见郭世英在他们面前不屑开口（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，在校医室听到两人对话，他们说郭世英嘴硬得很，什么都不说，就是证明），或根本不谈他们想要的，他们的目的没

有达到，最终，恼羞成怒将他害死。这在现在看，是不可思议的，而在那个年代，尤其在农大，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个角落，草菅人命，太常见了，怎么他们就不会对郭世英下毒手呢？！

最后我想对残害郭世英的那几个人说几句话：

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或许你们可能已经退休，在儿孙的身边颐养天年；或许你们还在发挥余热，在田边、还在实验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观察你们培育的新的作物。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你们活得心安理得，是吗？你们生活过得很有滋味，是吗？你们难道从来不做恶梦吗？你们的良知（如果有的话）从来没有被咒语唤醒过吗？你们可以说，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，够了，我已经听够了！一切想逃脱自己罪责的诬陷者、打手、刽子手等等像你们这样的卑鄙小人，现在无不用这同一说辞为自己解脱和申辩，没有用的！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，你们毕竟是“一小撮”。你们这“一小撮”，传承着的是文明的负一万次方的卑劣。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，看到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时，那台下晃动着特务的影子。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，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，因为争论有价值。但你们！任何时代、任何国家，你们都是要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。北岛说得好：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”，正因为你们是卑鄙者，你们在那个时代才获得了一张张让卑鄙横行的通行证，别人无此“特权”。

那么“我们就死定了？”你们也许会这样说。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你们曾经对人吼过的：“踏上一万只脚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”的时代了。你们还是有获得宽恕可能的。具体说，要是你们真正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所忏悔，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来，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说出来，尽管我已经认定郭世英就是你们杀死的。现在再没有“大师傅”来做调查组的组长（1978年，郭沫若去世后，依于立群女士的要求，农大成立了一个调查组，想调查郭世英死的真相。组长是位政治上可靠而专业上一窍不通的食堂大师傅，可以想象会调查出什么结果。），你们的罪行也已经不会再受法律的制裁，只有道德的法庭对你们的灵魂进行审判。而那句早已经不合时宜的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政策，对道德法庭来说还是适用的。怎么样，你们有胆量吗？我等着。

郭世英走了，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，在我心中，他是永恒的。

2006年10月

□ 来源：《博讯》网

~~~~~

【史实辨析】

“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”作者江晚铸之谜

• 张鹤慈 •

江晚铸写的“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”在去年网上发表。已经整整一年了。

现在，我想谈一下这篇文章的始末，和我的疑问：谁是江晚铸？她（也许是他，不过作者是男性的可能性不大）为什么写这篇文章。

江晚铸和我们最早的联系，是在孙经武办的X网站（<http://hw001.gate01.com/jingwujisha/>）的访客留言，她问起了X的另一个成员叶蓉青现在的状况，似乎都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。

因为留言有她的电子信箱的地址，所以我们就给她回了信。不久，她就寄来了她的文章“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”。

文章非常感人，我们都是含着泪读的。考虑在国内的正式刊物上发表，影响会大一些。我们委托了徐晓在国内发，并且告诉了江晚铸，同时请她考虑，她的文章的结尾，可能在国内发有阻力。第二天她就发给我们新的结尾。

文章没有在国内发，江晚铸也从来没有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照原计划，在国内发，她给了我们的文章后，就以到加拿大看孙女为由，和我们断了联系。

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国内发表，是我们发现，文章的真实性有问题，而且是重大的问题。

开始我们认为文章是真实的，因为对郭世英内心的把握，非常准确，比周国平和曹天予写的都准确。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假造的出来的。但开始我们不是没有疑问。虽然我们从内心里愿意接受这样感人的文章，也因为文章中有一些事，不是外人所知道的，特别是一些小节和细微的情感，不是谁可以了解，或编造的。但我们开始也仍然是有所疑虑：一、从来没有听说过，郭世英有这样的朋友，而郭世英是一个几乎透明的人；所有郭世英的亲戚朋友，都不知道这个江晚铸，或这个小妹的存在。二、江晚铸的态度，时隐时现，三、和所谓的不巧不成书。文章的巧合处太多了。

但我们把文章认定为不真实，不是出于怀疑，而是有人提出了置疑。而且都是文章中的重头戏的部分的置疑。

文章最感人的部分是所谓的“千里救父”的故事——

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，他见到我们后，拿出两张照片，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（我忘了是“新华日报”还是“大公报”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）。其中一张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，另一张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。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，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。我们仔细看，就是郭沫若送给毛主席手表的报道。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，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，是郭沫若的亲笔。郭世英说，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，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，请他马上冲洗出来。回家后，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，我父亲很感慨，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，再次确认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。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，交给小罗，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，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不留你了，赶快回去救你爸爸，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。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，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，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，抬头看郭世英，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。

但郭沫若家属提出，关于郭沫若送给毛泽东手表的事情，是在郭沫若死后，于立群第一次公开的，所以解放前的报纸的报道是子虚乌有。这样，“千里救父”的故事，不管多么的催人泪下，也只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

第二个关键的情节是郭世英之死——

我又回到宿舍，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在说着对面楼里今天发生的惨剧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尽管除了我之外，别的同学都和郭世英没有什么交往。这时一位同学说：“我们楼上畜牧系的一个同学亲眼见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……”我马上问：“谁看到的？”那同学说：“就是那个领我们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学。”那位同学我知道，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，不过不清楚名字。于是我上楼，在四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学，她姓李。我直截了当问：“听说你看到了郭世英坠楼的过程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她也很爽快，说：“不是我亲眼见到的，我当时不是在领舞吗？刚结束，我们在楼侧怎么能看到？是她。”小李指着旁边另一位女生继续说：“她是我中学同学，现在在航空学院（或化工学院，我记不很清），昨天来的，晚上就住这里了，她看到的。”我就请那位外校的同学谈谈经过。肯定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说过，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。她说：“今天一早，你们都去早请示，我是校外的，没下楼。广播那么响，我也睡不着啦，起来望着窗外梳头，面对的就是那座楼。”她用手指了指，知道她指的就是6号楼，和这座5号楼外形结构都一样。

几年前，有人在网上发表了有关郭世英死的文章。文章和江晚铸现在写的类似，但比江晚铸早6年——

郭世英就是这时候自杀的。一天早上我们班早请示（早晨去毛主席像前背语录）回来，走到五号楼西边看见四个学生提着个麻袋，正向我们的方向跑来，到近处一看是个人，满身的血。回到宿舍，我正好有个化工学院的朋友来看我，前一天住在我这儿。郭世英跳楼时，她正站在窗前梳头，看到一个东西从对面六号楼二楼掉下来，到了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，后来才知道是个人。以后我们就听说死者叫郭世英，是郭沫若的大儿子。（见点滴：“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——清理阶级队伍的一段历史”，载华夏文摘增刊《文革博物馆通讯》（八十三）增刊第二四二期，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，（<http://www.cnd.org/CR/ZK00/cr83.hz8.html>））

该文比江晚铸的文章早6年发表，现在这个作者在美国，她出面指出，所谓的跳忠字舞的同学等情节都是捏造。这个梳头小妹，是美国的作者在串联时认得的，当时住在她的宿舍。不可能同时有两个梳头小妹，还同时看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。也同样不可能，一个梳头小妹，同时住在两个人的宿舍，而且这两个人还相互不认得。

基于江晚铸文章的真实性没有保障，我们通知了徐晓女士，她当然也不同意在国内刊物上刊登。

令我们不解的是：谁是江晚铸？她为什么写这篇文章？为什么给我们？

江晚铸把文章给我们的最好解释，是如果通过了我们，就应该能够通过别的对郭世英不那么熟悉的读者。（我这里没有用欺骗这个词。因为我们还没有搞清楚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）

所有郭世英的亲戚朋友，都不知道这个江晚铸，或这个小妹的存在。

网络时代，如果作者不想现真身，应该被允许。但既然可以不现真身就可以在网络上发文章。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出面回答我的问题：我对文章真实性的置疑是否有道理？对我提出的置疑，她是否能够反驳。

“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”发表后，我们没有跟进。没有写评论、读后感。原来写的也扔到了字纸篓里。江晚铸应该明白，我们对她和她的文章有看法，而且她神神秘秘的没有道理。时隐时现，而借口又十分勉强。

现在我们回想起来，这件事的处理，仍然有点不寒而栗。因为如果我们认可了这篇文章，就是认可了一个如毛远新代表毛泽东一样的，郭世英的代言人，郭世英的最后岁月的唯一的见证人，如果她说郭世英曾经说过我们什么，我们有口难辩。当时正是曹天子和周国平的官司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。如果我们认可了这个江晚铸，认可她是郭世英最后岁月的见证人，就是认可了一个随时可以出示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的遗嘱的人。

因为，就是这个神秘的江晚铸。时隐时现的，和我们，和我们原101中学的几个同学通过E-mail联系。而且，我们后来知道，她和曹天予联系，在X的官司上，居然帮助曹天予。李春光后来的替曹天予说话的文章，功劳应该就是这个神秘的江晚铸。这个故事我放在以后了。

2007-10-27 墨尔本

□ 原载：《博讯》

~~~~~  
【亡灵祭坛】

郭世英之死

• 周国平 •

◇ 世英是高干子弟的表率

到北京大学的第一天，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，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。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，这没有什么。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，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。那个报告乏味透顶，郭世英并没有听，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。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，一个接一个发言。郭世英也发言了。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，微低着头，长发下垂，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。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，话音很低，有时几乎听不清，仿佛不是在发言，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。

后来通过交谈，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。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〇一中学，在学校里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、模范共青团员，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。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，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，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，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，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。但是，到快毕业时，他开始反省自己，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，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。离开一〇一中后，他进外交学院上学，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，休学一段时间，然后转学到了北大。

进入北大后，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。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，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，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。可是，这一努力并不成功。时过不久，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，冲突在所难免，内心十分痛苦。从第二学期初开始，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。1963年5月，东窗事发，他们三人被捕。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，就离开了北大。

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，他显然喜欢我，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。只要他在学校里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。我们住同一寝室，早晨一同漱洗，一同上食堂。去教室上课，往返路上，他骑自行车，我就坐在后座上。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，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。晚上熄灯后，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，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。

◇ 周恩来说：“世英是为我死的”

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，他们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，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。从文革初期起，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。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“东方红”，按照一种解释，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，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。世英死后，周恩来来到郭家，还曾说了“世英是为我死的”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晚上我去郭家，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，不让我进去。这是很反常的，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，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。我只好说找郭庶英，门卫打电话，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。一到内院，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。两天前，也就是星期五，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。那一天，他匆匆回来过一趟，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，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。

随后，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，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，又急冲冲离去。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，那天她在学校里，门房告诉她，郭世英来过，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。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奔往农大，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，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。我往郭家打电话，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，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。傍晚，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，林伯母开门，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，说：“郭世英自杀了！”我瘫坐在床上，头脑里一片空白，无休止地流着眼泪。

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，年仅26岁。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，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，被同学听见，诬他里通外国。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，并打算携肖肖远走，不幸被抓获。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，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，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，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。事发后，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，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，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。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，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开肉绽。遗体于第二天火化，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，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，未能见最后一面。

◇ 是自杀还是他杀

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，已成千古疑案。关于事情真相的惟一证词来自凶手，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，看守回来时，他已跳楼。从动机看，世英也是不想死，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。在逃跑前，他留下一封绝命书，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，大意是说，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但不可能，既然这样，还不如去死。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，不过，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，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，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。所以，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。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便是他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。



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。于立群一直在哭，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。看见我们，她号啕大哭起来，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：“对不起你们啊，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，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……”透过窗户，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，正弯着腰，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。我走出去，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，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。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，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《暴风雨》，夹在其他书之间，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。当然，我让一切维持原状，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。晚上，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，她仍在哭，平英蹲在她身边，一边给妈妈捶背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。走在街上，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。

在世英被关押期间，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，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。如果他说了，周亲自出面干预，世英也许能够得救。但是，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，没有忍心说，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。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我也是为了中国好……”便说不下去了。可以想象，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。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，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，在几个月时间里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，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，亲手装订成八册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。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，我不禁黯然神伤。

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，无数次地梦见他。每次梦见他，他都仍然生龙活虎，于是我自己对自己说，原来他还活着，可是只要这么一想，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。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，我仍会做这样的梦。在这一生中，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。

2006年10月

□ 来源：《爱思想》网站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本期编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： | 《CND》总编： |
| 华新民（美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思语（美国）      | 陈天寒（美国）  |
| 《华夏文摘》网址： <a href="http://www.cnd.org/">http://www.cnd.org/</a> ，国际刊号 ISSN 1021-86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投稿专用地址： <a href="mailto:tougao@cnd.org">tougao@cnd.org</a> 其它事项请电邮： <a href="mailto:cnd-cm@cnd.org">cnd-cm@cnd.org</a>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
---